

五四在北大

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
沙灘區分會理事會

聯絡部



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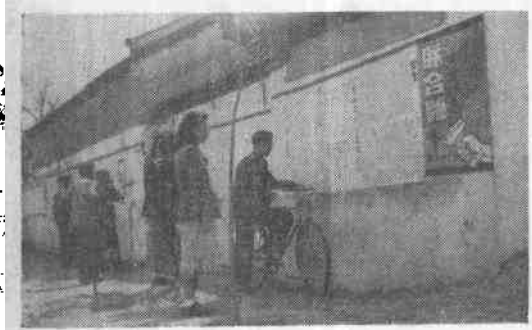


北大壁報聯合會委託 **風雨** 社編輯兼發行

2206
171

魯迅先生遺稿

通之先生：
 字給獨秀的信，啟孟以為此中二個辦法最好，
 他現在生病，醫生不許他寫字，所以由我代為
 聲明。
 我的意思是以為三步驟可以，但此就系同一一定要
 辦，便可以同上而改而為二個辦法更為順多。至
 於發表新宣言說則不獲政以，我卻以為不必，這因
 然一事在二聯中人以弱，其空列凡數年同人所作的
 作品，幸而如何宣言，言後總是不滿意，不滿意
 的。因此之要其新思想與文的氣息還厚起來，我
 所知道的或今後者，在希望新青年以此——就
 此——
 一月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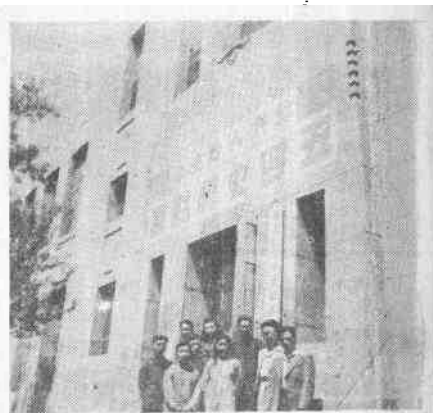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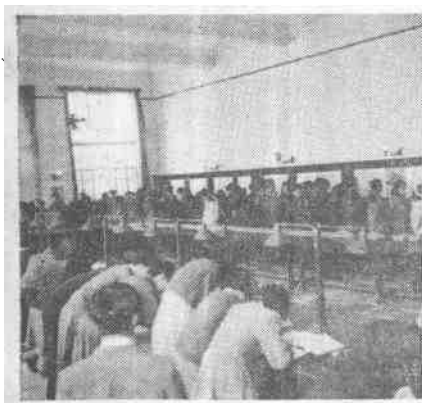


報型型巨的會合聯報壁

018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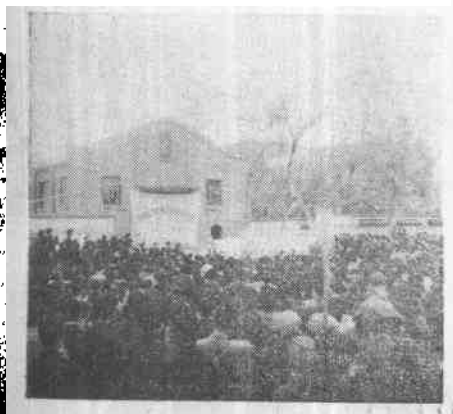
F762/08

↓ 參觀史料展覽者



↑ 今史料展覽門前

↓ 四五年前之歷史晚會



↑ 北星體育會主辦體育表演

蔡子民先生贊

他是自由主義的保衛。

當今天的「自由主義者」成了「珍寶」，成了獨裁政權的點綴品；當今天的「自由主義」幾乎成了學術史上的名詞，成了無從兌現的支票；我們懷念他，我們永遠永遠忘不了他——他這中國的真正自由主義者。

他就是自由的化身，民主的象徵，我們永遠朝向他前進。他就是我們的希望，他就是我們的信心。他的名字，在黑暗的現在，光耀燦爛。就是在光明的未來，也永恒地發亮。

目 錄

蔡子民先生
我們的呼號

科學晚會

附錄：袁翰青先生講辭

文藝晚會

歷史晚會

附錄：許德珩先生講辭

樊弘先生講辭

經濟晚會

史料展覽和返校節

爲五四而歌

血淚的控訴

營火記

從「五四」談到學生運動的方向

雜誌科學

寫給師長們的一封信

去年的五四聖地

人物誌：李大釗 傅斯年

朱家驊 段錫朋

凱旋

檢討「五四週」

編後

我們的呼號

「五四」，二十八年了。

「民主」，「科學」，今天我們悲憤地問：「民主在那裏」？「科學在那裏」？

「外抗強權，內除國賊」——二十八年前鮮明的旗幟，但是，今日的中國是否掛斷了強權國賊的桎梏，站立起來！

二十八年來中國在苦難的道路上拖着脚步。帝國主義者，軍閥，既得利益集團，既絞殺了民主，也窒息了科學。

抗戰勝利，痛苦迫害仍然繼續，民族危機沒有消除，人民仍沒有翻身。今天，中美商約比二十一條出賣了更多的民族利益，在美帝國主義幫助下，屠殺人民的內戰正在瘋狂地進行。青年們在前線當炮灰，在後方遭迫害，他們輾轉在失學、失業、疾病、流亡的線上。

今天自由變成了獨裁者的專利，科學做了屠殺人民的工具，新的侵畧者可以握手言歡，漢奸國賊加官晉級，而熱愛祖國的人民，變成了應該絞殺的

仇敵。我們控訴！

青年們，承繼五四叛逆精神的青年們，舊時代完了，新時代正在開始，一切的生命，都是在戰鬥中向前，我們要跨過罪惡與不義的山嶺，為自由民主的新中國戰鬥！

青年們，有自由靈魂的青年們，有五四血統的青年們，在黑暗裏，我們相信火在燃燒，在夜空下，我們要指出極星。

我們，一群在北方的年青人，向全國發出響亮的呼號：

「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

「爭取人民世紀的民主！」

「切實保障人權！」

「科學應服務於人民！」

青年朋友們，團結起來！

北大、清華、燕京、中法、師範五十餘壁報社

科學晚會

以一個噴水池做圓心，新綠的樹木圍着一大塊草地，五一科學晚會是在這富有詩意的環境里開會的。鄭華熾先生首先點出了這一幅場面，他說：「平日上課講書好比吃大魚大肉；今晚，我們吃一點小菜。」

鄭先生說：科學發達的前提條件，第一是人材，第二是資本累積，第三是時間，第四是合作。

鬚鬢白髮的汪敬熙先生在期望的眼睛中走上了台，「我是五四時的一個學生」他以此為驕傲。「今晚是科學晚會，我不談民主吧！」他很惋惜他今晚不能談民主。他無情地諷刺北大的「科學」，同學們報以熱烈的掌聲。

「二十八年前提證大禹是一條虫的人，今天承××之命找出大禹的生日是六月初六了……」出賣五四的人們聽着吧！

「又一位五四時代的學生」（楊鍾健先生自己介紹的）跑上台來了，楊先生是五四時的健將，今天是在研究古生物學的權威。他步入會場前，即向同學們指示，當時，這間教室是甚麼會的辦公室；那間教室又是甚麼會場。二十八前的情景，歷歷如畫。他非常惋惜今晚是科學晚會，不能談民主。

袁翰青先生莊嚴肅穆地走上了講台，他有條不紊，列舉證據，像證明科學上的命題一樣，引導出他的結論，他說：科學家不承認有錢的人服務，應當為人類為國家，為社會。掌聲是歷久而不衰的。

馬祖聖先生剛從美國回來的感慨很多（大概真不懂敵國的國情），所以這也不憤，那也不憤。他一再說：不談民主，不談民主。結果還是談的民主。科學是一把兩面都鋒利的刀子，誰把握着牠，牠就屬於誰。科學與民主分離是可怕的呵！

學者型的孫雲鑄先生感慨似的走上台，回味當年五四的情景。他舉出一個當年轟轟烈烈的同學後來墮落了例子。孫先生說：要不墮落，必須第一，養成獨立的才行，第二研究科學必須着實際，不能取巧，第三必須有私德。

楊鍾健先生說：「科學精神就是找問題」。散會了五百多青年在五一晚會裏找着許多問題，回去了。

附錄

袁翰青先生講辭

今天是五一勞動節，恰好選擇今天起來開始紀念五四，或者是多少有點用意的。

在現在的這個時代，科學工作者很痛苦，內心非常矛盾，因為一個作科學工作的人的目的在找真理，揭發秘密，使人類增加控制自然的力量，謀整個人群的福利，我們現在關於自然界的秘密已知道了不少，控制自然的力量也增多了，但是造福人群的問題呢？近日科學家對此還有疑問，心情上覺得很矛盾，剛才鄭先生提到的那位研究原子能的 Dr

Y先生，會說「一篇文章叫」an Frieded，意思說「科學的成就如不能好好的應用，實在使人類的前途很悲慘。」科學的目的在找真理，在使人能控制自然，這就像是打了一把好刀，如果交給一個好廚子去用，他可以作出一些好菜來，但假如交給了瘋子就可造成無窮的罪惡，今日的現象就有這種危險，我們想到今日控制自然的力量是不是掌握在想為整個人類謀幸福的人的手上？在這三百年內自然

科學的發展很大，人類組織的關係還趕不上控制的力量，如果科學工作者讓科學發展下去，不注意控制的力量，這樣下去是很危險的。

二十八年前的五四提出了「德先生、賽先生」的口號，按說今天晚上應該紀念賽先生，但這二位是無法分開的，如果沒有德先生的輔助使賽先生站在為多數人謀福利的立場，單獨一個賽先生是沒有益處的，也許還有反作用。

剛才鄭先生告訴了我們科學研究的先決條件，我們想到科學本身除了上面四個條件外還需要一個時代社會的背景，如像這樣講起來很空洞，但是仔細分析一下却是很實在的，讓我們來追溯一下科學的歷史，真正談得到科學的還是近三百年的事，從十七世紀到現在的三百年裏面，科學本身有很大的進步，科學本身已有許多證據證明現在的科學已不是十七、十八世紀的科學，我們現在已知道的很多，我們可以說今天晚上各位所知道的物理一定比牛

頗知道的多，因為這是一種科學的積累，三百年來作科學研究的人也有改變，（這是指某一類人）在十七、十八世紀時作科學研究的有三類人，第一類是當時的貴族，因為他們有錢，所以作科學研究，

這就是O. B. 研究室主任，這種例子在英美很多，由這裏可以看出三百年來社會變化和科學發展的一些關係。

第二類是一些從事宗教的僧侶、牧師，第三類是有錢的地主階級，這一類的例子很多，他們不把科學當作一種職業，只是看作一種玩意，拿它消遣，如所謂化學之父的Lavoisier 是法國有名的貴族，在遺傳上有成就的Mendel 是天主教的司鐸，氧氣的發現者Ristley 是一個牧師，Galileo 和宗教也有深切的關係，Newton 是一個有錢的地主等，由此可知當日的科學研究者只是消遣，並沒有看到科學與社會人生的關係，到了十八世紀末年，十九世紀初年，科學研究工作能變為一批大學教授，他們有固定的職業，優良的設備，他們的責任是教育青年，因為他們自發的興趣及社會的使命而繼續研究，所以這時的發明多半是些大學教授，在現在二十世紀，情形又異微有點不同，除從事教育的教授們雖仍然做着研究工作外，又添了許多職業科學家，這個名字或者有許多人不愛聽，但實實在在是有這一類人，他們是爲了政府機關，或者是私人工廠的研究室作事，如美國有名之理學家 Irving Longmu

從三百年來科學與人類社會的關係來看，最初看不出有什麼關係的，好在牛頓作的 Principia 就沒有工程問題，或者是機械的利用，而當時實用方面的發明，像司帶芬生發明火車，富爾頓發明輪船，瓦特發明了蒸氣機，從科學的立場看他們並不是科學家，沒有利用科學原理，僅僅是改造工具而已，這個時期科學與人類社會的關係很淺淡，到了十八世紀末葉，十九世紀初年，工業發展了起來，也就是資本主義加速了它的進展，他們希望把出品的品質提高，成本減低，因而需要研究，於是就利用科學的成果，作工業方面的應用，有許多科學家得到了補助，因此，科學幫助了工業發展，工業也幫助了科學，我們分析他們的背景，就可看出資本主義高速的發展，這種發展到現在是更爲加快。

目前的實際情形，在研究科學的整個立場看，可以分作兩方面，第一是英美等歷史久的資本主義國家，他們用競爭的方式來加速發展工業，第二是社會主義的國家，科學發展的情形，近幾年來我們沒有蘇聯的統計，只是在前幾年英國人克羅梭德（

(Growth) 作「一部書」[Soviet Science] 告訴了我們一些詳細的情形，他們有兩千多個研究機構，這些不是私人工廠全為國家經辦，由 M. I. S. (人民重工業部科學研究部) 計劃連繫，他們不是用競爭方式，而是用有組織有計劃的方式推動，他們不單是有許多大的科學家，像物理學方面的 Kapitza Joffe，化學方面的 Semenov，生物化學方面的 Bach，植物生理方面的 Maximov 等。而且尤其多的是中級科學家，前不久在汪先生主編的大公報自然科學欄內談到蘇聯物理的情形已超過美國不少，至少在低溫研究方面，例如液體空氣可以大量應用，是超過美國了，甚至液體氦，液體氫已經可以供給大學生普通實驗。他們雖然好像沒有理論上的重大發明，但在短短的二十多年裏，才能發展驚人的進步，並且對於人生的應用更廣泛。由此可見科學不一定要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在有些時候，資本主義的存在對科學反而是一種阻礙，例如美國曾有人研究出了鈹的提煉，可以有很好的方法，本可與鍊鋁相競爭；這種方法立刻就被一個製鋁大公司買去不用，以防止損害了這個公司的利潤，所以這是我們對資本和科學應有的認識。目前中國的情形，一般的科學工作者和學生，除了受生活的壓迫外都感到很大的痛苦，尤其是同學們感覺到沒有前途，沒有什麼事情可以作，各位

對當前社會應有之認識，就是中國現在既沒有達到英美資本主義的階段，又沒有進步到一個合理的社會，可以說還停留在封建社會的階段，固然我們可以說伽利略和牛頓是在封建社會裏工作出來的，可是我們不能希望現在中國有伽利略，有牛頓，因為科學進步得太快，現在已不可能與外界隔絕，像他們那樣工作一二十年後而希望能有什麼成就，我這並不是叫各位不要學科學，祇是使各位認清客觀的情形，這種種的困難希望不久的將來就可以克服，我們主觀上的努力不能因為客觀的條件而放棄，同時，從事科學工作者並不光是研究，還有許多別的事可以作，在中國社會裏，有科學訓練的人可推進通俗科學教育，灌輸給那些不能受科學訓練的人，使他們沒有復古的思想，打破他們的迷信，這也是我們應有的工作。客觀的認識還需要主觀的努力，剛才楊先生說北大有自由探討的精神，我個人在痛苦矛盾的心情下懇切的貢獻給科學工作者，不單是對本行的學問需要努力，還應該有熱情，如 M. I. S. 的 Madame Curie 那種的有熱情，愛國家，愛社會，愛人類，愛真理的熱情。今天紀念「五四」，「五四」之可紀念，不是因為是北大校史上的一頁光榮史，過去的光榮是值得留戀。我們紀念「五四」是要發揚「五四」的精神，重新鼓舞起青年的熱情，來推動中國的民主和科學。

文藝晚會

五四不但是「人的發現」，而且是「青年的發現」，一現在的發現」。

——朱自清：文藝晚會講詞

每一次文學革命，都是把腐朽的變態文明拉下去，回到人的初性，回到人最初出發的地方。

——馮至：文藝晚會講詞

民主的日子不遠了。新文藝的輝煌時代不遠了。

——丁易：文藝晚會講詞

外面下着雨。會場改在北樓禮堂。容得了五六百人的禮堂擠着一千多個人。外面還擠着好幾百人。

這是離昆明後第一次這樣多人的集會。昆明來的人默默地坐着，當然不免有人想到聞一多先生。在精神生活上，聞先生永遠和我們最聖潔的一部份連在一起。每一次文藝晚會，他隨着掌聲走進來，在全昆明學生的前面，他是先鋒。他代表着人類許多美德，代表着勇敢，代表着獻身（反自私），代表着友愛，代表着對黑暗卑污的無盡的仇恨。我們不由要想到他，在這黑暗得令人窒息的時候。

掌聲起來了。爲人們久違的朱自清先生和馮至先生在前面出現了，還有丁易先生和朱光潛先生。前兩位先生使人覺到特別親切。

朱自清先生第一個講話，半年來的事在我腦子裏閃過。在西單看見朱先生，又在報上看到他的文章。從警察打三輪車夫，罵「×你有民主思想的媽媽」，他「看出了時代的影子，北平是有點兒晃蕩了」。他說出人對文學新標準的要求，認爲這新標準是「民主」和「社會主義」。他談通俗化，談趙樹理的「李有才板話」。前進的時代在催他前進。朱先生是北大校友，今天他說他是「回家來了」。他講的題目是「五四時代的文藝」，說五四的意義不僅是「人的發現」，而且是「青年的發現」，「現代的發現」。五四之前，認爲人愈老愈權威；五四之前，認爲古代是黃金時代。到五四，這觀念才被推翻。

朱先生的語調永遠是平平淡淡，然而字字結實，經過了深思，值得人去領會。他分作三點來說五四時代的文藝：第一是「新文體到白話文」，他從清末的「開通民智」的新文體說到白話文的建立，說白話文的來源是小說，當時的演講，和宋以來的語錄。第二是「文學改良與文學革命」。朱先生提到陳獨秀和胡適當時所提出的主張。陳主張的三大主義總起來就是「人民語言」的文學。沒有他的激進

文學改革不會很快就流行。第三是「禮教與孩子」，魯迅先生沒有說什麼理論，然而他的創作爲新文學可以存在提出了「證據」。魯迅發現了禮教是吃人者的工具，是強凌弱時的護符。所謂強者，用我們現在的子眼來說，就是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魯迅喊出了「救救孩子」，「肩起黑暗的閘門」，放過孩子去，救孩子的辦法，就是「德先生和賽先生」。

朱先生結束了講演後，馮至先生走到擴音器前面，馮先生是公認的老實人，除了在功課上相當嚴之外，永遠是慈和的先生。他是一個詩人，也是一個哲人，寬厚而坦白。半年來他也常常苦痛不平，半年中他也走向了青年。

馮先生的話也是字字平實，沒有廢話，沒有八股，却給了我們一些東西，一些容易懂而決不顯然的東西。他講「五四以來的詩」。

「我常常在五卅紀念時講五四以來的詩，每次講之前我總要去翻讀『中國新文學大系』關於詩的一部份，是朱佩弦先生編的。這一次我又去翻了出來，讀了之後，聯想起我過去曾經讀過的詩集，這些詩集沒有一本在身邊，然而那些書的樣子，讀書時的心情，都還如在眼前。我想到中學時讀『嘗試集』，讀到康白情的詩，後來又讀俞平伯的『冬夜

』，郭沫若『女神』以及徐志摩的許多詩。

「這一次再讀這一本中國新文學大系，我又有一點新的感想。一方面覺到對當時的精神覺到慚愧；一方面又覺到詩和旁的部門比起來成績太弱，沒有一本趕得上『吶喊』的東西。」

馮先生說：在五卅之前的詩很多是北平士大夫捧戲子捧妓女的詩，高貴一點的則有江西詩派的艱澀難懂的舊詩。到五四，才有人提倡新詩，不但要破壞舊的形式，而且要擴充詩的內容。擴充內容有三方面：一是對光明的追求；二是對愛情正面的表示；三是對宇宙道理的啓發。在三十年前這種精神是偉大的精神，是積極的精神。可是新詩的成就却不如小說。沒有一本趕得上『吶喊』的東西。對愛情的表示，還攪雜了許多舊的情調，夾雜了感傷的不健康的成分。有的完全像西洋古詩換上了中國的文字。——缺乏真的體驗。對光明的追求也多半是空洞的樂觀，沒有指出到光明去的路，沒有走向光明的橋。對宇宙道理的啓發，像冰心宗白華的詩，雖帶着哲理的氣息，而情感和道理並不能互相化合，融爲一體。從五四到北伐之間中國不斷地混戰，詩中都沒有關於變亂的氣息，就是北伐這樣驚天動地的大事，也只有聞一多的兩首詩和徐志摩的兩首詩中提到一點。

民國十七年之後，政治上起了變化，知識份子

沒有出路，回到屋子裏和情感幻想遊戲而成了「象徵派」。象徵派的起源有兩種，一是受詞的影響，迷於小小的意境的優美；一是受十九世紀末葉法國象徵派的影響。法國的象徵派，本是想用新的顏色新的聲音表現新的刺激，也有相當的成就，但中國的家徵派多半是言之無物無病呻吟的東西。馮先生舉了李金髮的一首詩爲例這首詩是：

一
風與雨在海洋裏，
野鹿死在我心裏。
看，秋夢展翼去了，
空存這萎靡之魂。

二
我追尋拋棄之意欲，
我傷感變色之櫻唇。
呵，陰黑之草地裏，
明月收拾我們之沉靜。

大家聽了之後，闔堂大笑。

象徵派也有比較好的，如戴望舒和卞之琳的詩。戴，卞，孫大雨，梁宗岱和馮先生自己民國二十五年在上海出版了一種合編的新詩月刊，大體上仍多是遊玩自己意境的作品，共出了十期，發表作品有：艾青、何其芳、方敬、徐遲、曹葆華、李廣

田、卞之琳等。這些人在抗戰中離開了沿海的城市。有的參加抗戰，有的走入後方，與現實接觸多了，同時時代也不像前十年那樣朦朧，現在大家都已改變，努力於新詩的工作，「這是抗戰給我們的恩惠」，馮先生說。他又說覺到很難受的是戰後回到北平，覺到北平一部份文學雜誌仍受戰前那種象徵派的支配。

由抗戰到發生政治糾紛，到這以後，每個人所看的一天比一天真實，生活一天比一天痛苦，知識階級態度也漸漸改變，近一點說，這種改變後的態度接上了五四的傳統，遠一點說，可以說接上了詩經，楚辭，漢魏樂府，以至杜甫的傳統。這是真正的傳統。是不以高貴的人自居，從平實的人出發的文學。

「作詩的人不再是貴族，不再自命高貴——以前那些自命高貴的人，詩才高貴，行爲却未必高貴，像謝靈運，像王維，像李商隱——不自命爲一詩人」，才產生真正的詩歌。民國十五年時詩歌還是在客廳中唸給少數人領畧的，現在的朗誦詩則是給許多人享受的了。新詩的前途是無限的。」

丁易先生講五四以來的小說和雜誌，但他是從抗戰講起的。
「抗戰以來的小說繼承了五四以來的道路」，他說：「繼承了反帝反封建的傳統。」

歷史晚會

你們要向前看，不要向後看。向後看是沒有希望的！

——許德珩：歷史晚會講辭

北大的精神是負責任的精神，爲國民爲國家負責任去幹，幹了自己擔當的精神！

——許德珩：歷史晚會講辭

五月三日晚間的歷史晚會在紅樓後面大操場上舉行，最前面的人坐在地上，後面的人在凳子上，再後面的站着。有各中學的學生，有公務員，有軍人，有北大學生，最低的估計也有五六千人。「文藝社」和「新詩社」合辦的五四特刊售掉好幾百份，二百份燕京新聞一搶而光。演講的人有胡適，許德珩，周炳琳，容肇祖，樊弘。

胡適校長說當五四時他正在上海，聽說北平出了事才趕回來，他說到當時北大以教授爲中心，辦了一個「新青年」雜誌，後來學生們辦了一個「新潮」雜誌，不久又有了一個「每週評論」，都是鼓吹

他把抗戰以來的小說和雜文分爲幾個時期：

(一) 抗戰起三十年春院南事變。爲了(A)作家生活不安定；(B)接觸的方面多；(C)從事於宣傳；所以短篇小說特多，其中也不乏有價值者，如華威先生等。

(二) 三十年春到三十一冬太平洋戰爭爆發，是黑暗時期，沒有新出一種文藝雜誌。

(三) 三十一年冬到三十三年冬，文藝中心在桂林。爲了(A)檢查嚴格；(B)對作家的監視，短篇少而長篇多。作者讀者多需要長篇。產生出兩種作品：(A)寫過去，如「霜葉紅似二月花」和「姜步畏家史」；(B)曲折深入地寫現實如「淘金記」「鴨嘴湧」。此外還有用神話暗示的東西如張天翼的「天泥地角」，還有無聊的東西如「鬼戀」及無名氏的作品。

(四) 桂柳撤退，喊出了爭取民主的口號，產生了不少雜文(文藝性的政論)，至勝利後，雜文也沒有了，因爲(A)黑暗勢力承認自己黑暗，(B)生活不安定。丁易先生總結說，民主就要到了，新文藝將走上平坦的路，輝煌的時代就要到來。

朱光潛先生的演講很簡單，他說中國缺少系統的翻譯，說翻譯者必須具備中外文字的修養及對文學的興趣。他期望學生中能有人將來致力於這方面的工作。

新思潮新文藝的運動。新思潮的意義，就是要求民主（德先生）與科學（賽先生）。而在這兩者後面的精神，則是共同的，就是批評的態度——評判的精神。也就是尼采所謂「重新估定一切的價值」。對於是非、美醜、善惡的重新估價。有些過去認為尊嚴的制度（如裹足）。一經批評，馬上一點價值也沒有。過去認為沒有價值的（如白文話），一經確認價值，許多人就得到益處。如今至少仍需要一部人從事這個工作，回頭這二十八年，算到成績不夠，還希望能有人繼續努力。

×

許德珩先生的話充滿了熱情，感人很深。

「我今天坐在台前，有兩個感想。」他說：

「是兩個矛盾的感想。」

「第一個、我今天覺到多少年來沒有過這樣的愉快。今天我們可以聽到二十八年前的胡適之先生來講許許多多的事，使我覺到還像我們在「文學門」（那時北大還沒有「文學系」，叫做「文學門」）的情形，又看到許多老同學，更使我想起當時的溫暖。

「第二、我看到各位同學來，我覺到快樂，也覺到很慚愧。五四到現在已是第二十九個，三千年

爲一世，今天五四爲什麼還值得紀念？當時新文化運動提倡德先生賽先生——就是民主與科學，爲什麼今天還要青年人來紀念民主，紀念科學？因爲我們這一代做了三十年的夢！

「民主是反獨裁反不民主反奴性、對外反強權，科學是提倡真理、反對迷信，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封建作風。今天不只你們紀念五四，全國各地都有許多青年紀念五四，爲什麼？是不是懷古？是不是點綴？不是！因爲現在需要科學需要民主，而事實上則許多人在提倡迷信提倡復古！現在的青年，不會拿五四來裝璜、不會不前進、不會再不長進！」

許先生接着講五四的史實，他的話歷次爲掌聲打斷。

講完五四，許先生說有三點感想：第一，他覺得政府「進步」了，五四時學生們打了駐日大使，燒了官員住宅，然而沒有一個人被害，沒有一個人失蹤。（當時死的一個學生是害了三期肺病，瘵巧累死，不是爲政府打死。）第二、他以爲當時的學生是純潔的，學生總是純潔的，今天的學生也是純潔的，然而學生也進步了。第三、他指出當時的教師和學生是團結的。他的意思當然是希望今天仍要團結。

最後，許先生說他要追念幾個人。一個是蔡元培先生，有過一個當時的北大同學（「名字我不用了」，許先生說）。去找蔡先生闕字，蔡題了一行「已有恥」四個字，當後那個同學臉上有點下不來，「然而蔡先生是說對了的，今天有些人正是無恥」。在消極的一方面，蔡先生主張「有所不爲」，「當時我不懂這話的意義，今天我才懂了，那些人真是無所不爲啊！」（大鼓掌，夾雜了許多歡呼的采聲。）許先生又說還想起了五四被捕入獄後，許多同學都去公安局自首願意坐監牢，「這是北大精神，北大精神是負責的精神，爲國家爲人民負責去幹，幹了自己擔當的精神！」

許先生結束了他的演講，走下台來。
掌聲雷動。許先生和胡校長握手著手。

x

周炳琳先生的演講是說從五四到現在整個是「中年人利用青年人」。我們都很希望他的話沒有題外的意思，然而與當天大公報上所載他的談話同時來看，他是頗有「藉古諷今」之意的。中年人對青年人的不了解，恐怕又將是今日的一種悲劇——不是青年們的悲劇，而是中年人的悲劇。以爲歷史總是循環的，總是「以暴易暴」的，革命也無非「一

將成名萬骨枯，」大可不必的了。

對於周先生的不健康的悲觀思想，若是原因在他身體的不健康，我們希望他好好休養；若是並不是如此，我們希望他多與年青人接近、多多讀書——關於現實的書和文藝書籍，從這裏面得到一個「人類必會進步」的信念，這是作爲一個自由主義者不可或缺的信念。他對聞一多先生的批評，出發點就錯誤了，那句話也真是青年人受不了的（他說聞先生「近乎煽動仇恨」，却又並不指出這是對暴君的仇恨還對一般人民的仇恨）。

容肇祖先生說：「只有民主才能爲人民，只有科學能推進人類文明。」他說五四時學生有組織，不組織一切是空的。他勉勵學生，不要學「清談」，民主的人，不要學那些喪失了五四精神，拍賣五四精神的人。

樊弘先生希望進步力量團結起來，中國學生應和全世界的學生團結求進步。他檢討國民革命失敗的原因，說科學民主今天固然無人反對，而今天仍有人學「會剃頭」（會國黨的綽號），是因爲不能團結人民。大家應當互相督促。

x

x

x

附錄一

許德珩先生講演詞

(編者按：此稿未經講演人校閱，如有錯誤由編者負責)

民國七年四月，爲日本壓迫中國留學生，留日

，和我。

學生在春假中全體歸國，有郭沫若，王兆榮，李達，曾琦，雷震等。有一部份人在上海辦了救國日報（雷震柏當時不過是很不重要的一員，當時的救國日報和如今也完全不同），李達就到北平來連絡學生。那時候北大的學生代表是段錫朋和我，李達也來找過我們。北平的學校，當時有北大，高師，高工，醫專，藝專，俄文專修班等八校，一方面選了十幾個代表向總統馮國璋請願取消二十一條，一方面就準備示威遊行。當時的北平是以北大爲中心的，暑期有過一次大示威運動（這是中國示威運動的開始），並有代表去天津南京上海連絡各地學生。北平各校的學生，當時就籌備出一個抗日的刊物，到民國七年底，出刊物的計劃就具體化了，定名爲「國民雜誌」，資本由二百多個學生，每人出五塊錢湊成。但也有教員參加的，李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學生之中負責這刊物的有周炳琳鄧康（字中夏，後來曾在子右任辦的上海大學中做教務長）段錫朋

國民雜誌是在民國八年二月一日出版的，是學生抗日運動的總機關。同時出版的有新潮，則是主張文學革命的。當時的新青年和新潮，反對傳統文化，社會上預聞一點的人都對之側目而視，國民雜誌比較緩和（最初還是用文言的），讀者群比較廣大。民國八年三月，巴黎和會決定依照日本意志處理山東問題，中國留法學生首先反對在巴黎和約簽字（王世杰周鯨生都是當時在歐洲的學生），五月這消息非正式地傳到北京，北大首先響應，國民雜誌第一個反對日本的要求，五月三日晚各校學生同在法學院講學館（現在三院大禮堂）開會，決定第二天遊行。五三晚會除清華學生不能進城（當時清華進城必須坐火車），各校學生都有，共到二千餘人。五月四日早晨九時，北大學生齊集紅樓後大操場，再到天安門，原預備穿過東交民巷，因爲避免和日本軍警直接衝突，走到美使館前就折向北行到

（下接十六頁）

附錄二

樊弘教授講演詞

(編者按：此稿未經講演人校閱，如有錯誤由編者負責)

「……五四運動在教育原理上是否應該存在呢？學生運動是不是應該存在？」胡適之先生在民國九年說了一句關於五四運動的話，大意說：學生運動從某一方面說，是不應該存在的，青年與學生應該讀書，但是，當政治不太平，中年人沒有希望的時候，就爆發了學生運動。如漢時太學生，辛亥前的留學生，朝鮮的青年，俄國的學生之參加革命。為什麼他們要參加革命？因為社會太黑暗，青年學生運動便成爲不可避免的，在正常狀態下是不會存在的。青年人追求真理，只有黑暗壓到社會時，才應該存在。也即是說，正常時不會有，不正常時應該有。

現在，要問政治是否清明？中年人是不是可以讓我們放心？假如不是，學生運動還應該存在。這是我對第一個問題的答覆。現在，社會是黑暗的，世界是黑暗的，不但全國學生要組織起來，而且要全世界的青年聯合起來！

第二，在五四運動時，當時的口號是「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對外打倒帝國主義，對內肅清官僚階級。為什麼發生在民國初年？當時，官僚階級勾結帝國主義侵畧中國人民的利益，中國青年乘着帝國主義互相衝突的時候，聯合起來，要打倒他們，肅清官僚。

現在講第三個問題。我是北大學生中最不進步者。五四沒趕上，沒有什麼功績可講。前天，有兩位同學談到從前領導五四的領袖，有的從事科學的研究如汪敬熙，有的繼續領導青年，但有的漢奸如陳公博，還有某人現在抽大煙，當然與「科學、民主」隔得很遠了。為什麼有的如此不振作？如此反動？顯出悲觀的情緒，記得，蔡先生（指蔡子民先生——記者）到北大即打算改變風氣，提倡青年應該有道德。我對這問題有一種看法，一個人上了政治舞台，在某方面若沒有權力限制他，就可以濫用威權。學生領袖有威權，到社會上就可以濫用威權。